2026年11月15日
星期日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李金宝
校对　张家梁

为国存文，如赴战场

话剧《振铎》演活“护书先生”郑振铎



话剧《振铎》现场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周成　宋金峪

近日，暨南大学原创大师剧《振铎》作为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重点展演剧目连演三场，恰逢暨南大学建校120周年，这部以郑振铎“孤岛”时期在暨大办学、抢救古籍事迹为核心的校史大戏，展演后引发各界强烈共鸣。羊城晚报独家专访郑振铎先生之孙、知名学者郑源，以及著名爱国侨领庄世平之外孙、中国侨联常委林伟农，从新发现的日记史料、跨越时空的先辈交集、校园戏剧的传承价值等维度，解码一代文人的文脉坚守与新时代湾区青年的精神回响。

孤岛日记：看见作为暨大师长的郑振铎

作为郑振铎嫡孙，郑源是当晚最特殊的观众之一。此前他已看过《振铎》的演出录像，此次首临现场，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让他数次动容。“现场的感觉更加震撼，看到动情处，我也会流下很多的眼泪。”郑源说。

谈及剧中最触动自己的桥段，郑源提到了开场郑振铎离家避险的场景。“我和奶奶感情非常好，在剧中看到奶奶送爷爷离家的画面，就想起奶奶说过，抗战那些年爷爷经常被迫外出躲避，有人来搜查时，奶奶就打电话让他不要回家。”虽未经历过那个年代，但祖辈的口述记忆与舞台情节形成共振，让他深深共情当年的风雨飘摇。

对郑源而言，这部剧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串联起了祖父一段曾几近湮没的岁月。他透露，2023年上海朵云轩拍卖出现了郑振铎1939年的日记，为研究他在上海“孤岛”时期的活动补充了重要的一手史料。此前学界关于他“孤岛”阶段的研究，到1939年便多有留白，相关一手史料极为稀缺。“这本日记一天都不少，365天完整记录了他的生活。”

郑源耗时两年多整理的《郑振铎日记（1939年）》于今年出版。根据日记记载，1939年的郑振铎生活极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准时到校授课，下午处理校务、整理图书馆藏书，晚间参与聚会和抗日救亡活动。他不仅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更是何炳松校长的左膀右臂，参与课程审定、教师聘任、学生招生甚至监考等各项事务。

日记里的诸多细节，也与《振铎》的剧情形成了呼应。比如6月3日记录的“王伍本被捕”事件：台湾学生王伍本因逃避日本兵役来到暨大读书，被日本宪兵逮捕。日记中也记录有暨大另外两名学生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后，郑振铎请律师介入，当天下午就成功营救出来。

存史有尺：艺术虚构须守史实根脉

针对“戏剧虚构与历史真实”的边界问题，郑源有着清晰的判断。他认为，《振铎》以虚构的审讯场景串联史实，所有核心事件与精神内核都是真实的，这是艺术创作可接受的虚构。这与当下部分AI短剧全无依据的胡编乱造有着本质区别。“有些AI剧说郑振铎把古籍藏在棺材里，完全是胡说八道。年轻人看了信以为真，就会对历史产生偏差。”

他提到，马伯庸即将出版的小说《楚弓计划》取材于郑振铎抢救古籍的背景，虽有人物虚构，但核心史实有据可依，同样是值得认可的创作。“虚构可以，但不能丢了历史的根。”郑源如是说。

“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郑源用郑振铎常说的一句话，概括了祖父的文脉守护精神。他解释，当年江南古籍要么毁于日军炮火，要么被外国人低价劫掠，祖父常说“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支撑他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上海抢救文献的，就是“书生报国”的信念——把保存民族文化的担子挑在肩上，一息尚存，绝不放下。

对于暨大师生的演绎，郑源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全体参演师生都不是专业演员，却呈现出专业的舞台气质，令人钦佩。”他衷心希望《振铎》能够走出校园、走出广东，到更多地方交流展演，让更多人读懂先辈护书存史的赤诚。

双璧同辉：文心与侨心合力迎回国宝

著名爱国侨领庄世平的外孙、中国侨联常委、广东省侨联常委、暨南大学侨联名誉主席林伟农，同样是带着特殊的情感走进剧场。在他眼中，郑振铎与外祖父庄世平这两位爱国同道，前者以文护脉，后者以金融报国，身处不同战线，却有着同样的家国初心。重庆陪都时期庄世平在南洋募集抗日物资，输送给郑振铎、邹韬奋、田汉等左翼文化人士，早年便有联络。

林伟农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往事：1951年，“三希堂”中的《中秋帖》与《伯远帖》被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赎期将至，眼看可能流入海外。当时在香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的庄世平从银行界闲谈中得知消息，恰逢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途经香港短暂停留。

“我外公不是文物行家，但他觉得国宝不能外流，就立刻把消息告诉了郑振铎先生。”林伟农说。郑先生随即紧急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汇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购回。由于当时外汇紧张、对外通道敏感，整个过程极为隐秘。

据林伟农转述外祖父生前回忆，原定赴港鉴别的文物专家因海上风浪中途折返。国宝赎期迫在眉睫，庄世平便以南洋商业银行信誉作保，协助把两件法帖从汇丰保险库借出核验真伪，再推进谈判。郑振铎则在文物回购上持续予以专业指导和推动决策。最终，本息共488376.62元港币，两件国宝顺利回到北京，同年12月27日正式入藏故宫博物院，这也被公认为新中国回购流失文物的第一役。

“一位在文物界，一位在金融界；一个用生命守护典籍，一个用金融打通通道。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战线，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把国家牢牢守住。”在林伟农看来，外祖父一生的选择背后，是一份朴素认知：所得皆来自祖国，最终亦当归于祖国——他将所持南洋商业银行、南通银行全部股份无偿捐赠给国家，没有留给子女；郑振铎则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献给典籍守护。

谈及《振铎》这部校园戏剧，校友林伟农表示，把校史里的动人故事搬上舞台，比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暨大是华侨最高学府，很多港澳台侨学生之前并不了解这段历史，通过戏剧的形式，能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到先辈的奉献精神，建立更深的文化认同。

“家国在，则文化在；文化在，则根在。这大概就是‘侨心’与‘文心’相通的地方。”林伟农说，大湾区校园戏剧季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希望未来能挖掘更多湾区先辈的故事，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精神、凝聚共识。

全场共情：舞台上下的精神回响

《振铎》的感染力，也传到了台下。

曾在2024年首演中担任郑振铎A角的广东省话剧院国家二级演员郭瑞，此次以观众身份到场。他表示，本次复排在舞美上做了“减法”，简化了布景却没有削弱作品的力量，“在简版的舞台上能呈现出这样的作品，我是比较震惊的”。

暨大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少堂介绍，整部剧由学校师生自编自导自演，演员虽非专业出身，却用心用情演绎，传递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暨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苏运生观后写道：“木铎金声，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它需要被敲响，被听见，被回应。”

现场的青年学子同样深受触动。文学院2025级汉语言振铎班本科生叶彤表示，剧中众人志愿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场景最让她震撼，“就好像前人的决心通过这一幕穿越时空，传到我们每一个振铎班学子心里”。

恰逢暨南大学建校120周年，200余名师生共同打造的《振铎》，让先辈的坚守在青年人的演绎与观看中得到回应。

“十个治好九个”，他却总惦记着“那一个”

“国之名医”王树森与三阴性乳腺癌的三十年较量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图/受访者提供



王树森

周三的清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2号楼的长廊坐满候诊的人。有人拖着行李箱，跨越千里赴诊；有人就着牛奶啃着馒头，希望能早一点看到医生。安静的长廊里，有人在打盹，有人在小声交谈，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疲惫。在这群人当中，有一部分就是三阴性乳腺癌患者。

王树森教授的专家门诊，一周只开两次。从医近三十年，他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乳腺癌单病种首席专家，2026年9月获评“国之名医·卓越建树”。在无数乳腺癌患者眼里，他是能抓住一线生机的人。但他最先和记者谈起的，不是亮眼的治疗数据，而是一次让他沮丧的门诊。

“本周一上午出门诊，心情一度是沮丧的。”王树森语气平静，却明显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失落。几十个病人看下来，有几位的治疗效果远不及预期。而这些棘手病例，大多指向乳腺癌里最难啃的一类——三阴性乳腺癌。

乳腺内科门诊里最难的那种

55岁的那位女患者，王树森记得格外清楚。这位女患者来自湖南，一年多前在当地确诊三阴性乳腺癌，此后接连换了6套治疗方案。“我发现，每一种药，初用都能看到一点起色，可短短两三个月，耐药就来了，肿瘤迅速在肺、肝脏接连出现转移，真的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了。”其实，临床上，这样的病例并不少见，更危重的患者，病灶扩散至肝、肺、脑乃至出现全身转移。这样凶险的疾病自然会让医生和患者的心情沮丧。

“医学一直在进步，疗效持续提升，但临床上依旧有不少难治的患者。这是我们持续面对的难题，也倒逼医学不断向前探索。”这也成为王树森不断学习的动力。

同样是乳腺癌，有的人能治愈，有的只能活几年，因为分型分期有较大的差异。HER2阳性亚型，有成熟的抗HER2靶向治疗；激素受体阳性，数十种内分泌药物可供长期选择。唯独三阴性乳腺癌，免疫组化报告单上三个关键指标——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HER2全部阴性，几条主流治疗通路几乎对它关上了大门。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外地甚至境外的难治的患者辗转找到这里。

难治的病例，总是向顶尖医疗中心汇聚。而医生看的病例越多，越容易触碰到医学暂时无力跨越的边界。“在治疗时，我们要保持乐观，但必须承认，部分患者我们依旧束手无策。”王树森坦言，医生拼尽全力，却依然帮不到患者的时候，沉甸甸的责任感就会压在医生心头。

“凶险”标签不应代表绝望

很多人听过一个说法：十个乳腺癌病人里，九个能治好。这句话，王树森并不避讳。但他不想让大众对三阴性乳腺癌只留下“绝症、最难治”这一个标签。“整体来看，绝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最终预后不错，不少人可以平安生存十几年、二十年，成为康复者。”

乳腺癌的分期就是隔开希望与困境最重要的分水岭。据统计，三阴性乳腺癌整体5年生存率超过80%；早期病灶局限在乳房、直径不足两厘米的一期患者，5年生存率超85%，很多人可以直接手术，部分甚至不需要后续内科治疗。

可一旦疾病走到另一个阶段，结局就完全不同了。腋窝、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局部晚期患者，尚有机会，但风险已经陡增；万一初诊就伴随肝、脑远处转移，才是真正的不妙。

过去数十年，三阴性乳腺癌生存率实现了大幅抬升，从早年30%—40%提升至当前水平。但基数之下，乳腺界的顶级专家依旧面临挑战。我国每年新确诊三阴性乳腺癌病例约5.6万例，按照现有诊疗水平，仍有一万多名患者，可能会成为那“治不好的一个”。

“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定方案”

在乳腺内科门诊里，有一种情况让王树森特别警惕：患者刷遍网络文献、听病友分享用药经历，拿着别人的成功方案，要求医生照搬给自己使用。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定方案。”他常常需要和患者解释一个现实：哪怕是顶尖乳腺科专家，也没法打包票某一套方案一定有效。一款新药有效率60%—70%，言外之意，就是还有30%到40%的人使用后无效。

同样一句话，落在不同性格的患者身上，感受天差地别。“告诉患者有效率六七成，心态乐观的人会抓住六成希望；有的人，哪怕告诉他有效率90%，目光也死死盯着那10%失败的可能，总担心倒霉的是自己。”这也是临床沟通最难拿捏的分寸，医学离不开客观数据，同时包裹着人文底色。直白地讲不良结果，很容易击溃一个薄弱的人；而一味画大饼、承诺保证，又违背了医生初衷。

不过，说到底，王树森更加鼓励积极乐观、保有信心。“治病，信心很重要，就像打仗一样，还没开战先悲观，等于一开始就输了。”心态和自身免疫力紧密相连，长期焦虑失眠、持续陷在负面情绪里，身体的抗肿瘤防御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王树森自己，也并非永远情绪稳定。周一那场满是难治病例的门诊，会瞬间抽走他的成就感。但他有自己的调节方式：看完那些艰难的病例，回头看看顺利治疗、病情稳定的患者，看见她们的好转与笑容，心里的重压会慢慢松下来。“人遇到难题，一定要学会自我调节。”

别把弯路走完才来医院

比起治不好的晚期患者，还有一类人的情况更让王树森觉得特别惋惜——那些本可以不走弯路、却白白耗掉宝贵治疗时间的患者。

有人三年前就摸到乳房异常肿块，心存侥幸一拖再拖；有人害怕走进肿瘤医院，逃避检查，寄希望于偏方调理；等到肿瘤破溃、疼痛难忍才赶来就诊，最佳窗口早已错过。王树森提醒，“患病之后，客观理性面对，有些路没办法重头来过。治病少走弯路，至关重要”。

很多患者以为，想要用好方案、跟着专家治，需要长期留在广州的大医院。王树森却说：“在我这里看过的病人，最后留下来治疗的不到一成。我们定好规范方案，患者完全可以回当地医院跟进治疗。”一位新疆的患者曾专程来看他的门诊，他告诉对方不必反复长途奔波：方案明确之后，回当地按计划执行即可，手术、化疗都是如此。优质的诊疗，核心是治疗方案正确，并非一定要挤在顶级医疗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乳腺外科一年有近6000例手术，患者走进诊室那一刻，王树森就要用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帮助患者战胜肿瘤。这几十年来，他不敢停下学习。“不能因为十年前的经验、十年前的疗效而感到满足。肿瘤领域更新太快，诊疗思路、药物年年都在迭代。”

采访临近尾声，记者不自觉又提到了那句“十个里面治好九个”。“如果十个病人，我能治好九个，我发自内心高兴。不会因为还有一个治不好，就否定所有努力，一直陷在沮丧里。”这是一位乳腺科医生和三阴性乳腺癌缠斗近三十年之后沉淀下来的治疗观。

医学有边界，有局限，有永远跨不过去的“那一个”；但医学也有持续拓宽的希望，有早筛带来的先机，有新药不断刷新生存曲线，有规范诊疗托起来的九成光亮。

诊室里每天依旧有人奔赴而来，有人带着希望离开，有人还要继续和顽固的肿瘤博弈。王树森教授和他的同行们要做的是，一边稳稳托住那九成希望，一边向着剩下的那一成黑暗继续往前走。

有本版新闻线索
请扫码加群报料

（本二维码有效期至11月20日）